

耶穌會士和新教徒到達日本

科斯塔*

在半個世紀裡，天主教在日本人看來是一個團結的整體。⁽¹⁾ 儘管存在明顯的分歧，但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²⁾ 同屬於一個教廷，雖然他們彼此爭奪對日出帝國貿易和宗教方面的霸權，卻都在努力創造條件往日本帝國傳教。⁽³⁾ 因此，日本當局對他們是同等看待的。自1600年起，由於第一批新教徒來到日本以及他們迅速與德川家族結盟，這種局面開始發生了變化。

天主教壟斷的結束

“博愛”(Liefde)號⁽⁴⁾的出現是一個偶然事件，對在中國海的葡萄牙利益並不構成迫在眉睫的威脅。當時，荷蘭人對葡人航線的進攻開始損害到葡萄牙的貿易，但是，這些為數不多的新教徒在日本的出現並沒有使日本人立即開始其與“北方敵人”的貿易。事實上，海運而來的商品並沒有引起特別的興趣：“一些大紅色棉布、厚棉布、鏡子、玻璃、金屬絲、珊瑚、許多耳飾和據他們說來自佛蘭德(Frande)的豪華飾品。”⁽⁵⁾ 雖然荷蘭在不斷地擴張，而英國船主們也不甘示弱，但在當時，他們對包括日本在內的亞洲周邊市場的滲透能力還沒有顯現。

儘管如此，在日本出現的對手仍然讓人擔心。因此，停靠在長崎的商船船長立刻試圖由他自己處理新來的人以及他們的財產，但是，德川家康(Togukawa Ieyasu)⁽⁶⁾ 對南蠻人的說法不感興趣，那些“紅毛人(komōjin)”才是挺有意思的。關於這一點，一個不知名的葡萄牙人於1615年寫的一份檔中為我們作了如下描述：

當奧拉西奧·內雷特(Horácio Nerete)⁽⁷⁾，一位澳門商船的船長，於1600年抵達日本並瞭

解到一些荷蘭人被扣押時，他極力說服日本的〔德川家康〕國王將船、大砲和人交給他，為此，他給了一個居住在長崎的葡萄牙人豐厚的禮物，此人是一個值得信賴的有權勢的人，曾經兩次代表他去見國王，幫他料理船務，在他爭取釋放因在日本傳教而遭到前任國王豐臣秀吉(Toyotomi Hideyoshi)⁽⁸⁾ 迫害的耶穌會神甫們的努力中，此人曾給予他幫助並祝賀他取得的巨大成功。然而，當他與國王的一個親信交涉此事時，這位親信告訴他說，國王已經保證這些荷蘭人的安全，讓他不要再提及此事。就這樣，他們按照我們說過的方式繼續留在日本。⁽⁹⁾

1600年10月20日，耶穌會監會神父范禮安(Alexandre Valignano)對這艘商船的到來表示了他的擔心，並把它與荷蘭人和英國在東方不斷的推進聯繫起來；他還談到了荷蘭人在日本人中推廣大砲的使用的危險性以及因此“帶來的巨大害處”。⁽¹⁰⁾ 當時，在關原(Sekigahara)，德川家康就使用了從荷蘭人那裡收繳來的大砲。⁽¹¹⁾

一些作者，例如威廉·科爾(William Corr)對在作戰中可能使用了大砲這一點表示懷疑。⁽¹²⁾ 我們沒有辦法來支持這種觀點，但在我們看來，大砲在關原的出現，的確具有突出的象徵作用，但並非德

*科斯塔(João Paulo Oliveira e Costa)，歷史學博士，里斯本新大學社會與人文學院教授，葡萄牙擴張史專家，出版過多部著作，尤其是關於葡萄牙在東亞的研究，現任里斯本新大學海外歷史研究中心協調員。



荷蘭人在長崎出島

川家康取得最後勝利的決定性因素。後來，德川家康曾在1614年和1615年對大阪的進攻中再次使用了西方的大砲。但是直到1618年，當英國－荷蘭貿易競爭達到高潮的時候，荷蘭人才開始將大砲零件的製造技術傳授給日本人，然而在後來的幾年中，日本人也祇是生產了幾門迫擊砲。⁽¹³⁾

儘管來自東南亞的威脅越來越大，在那裡荷蘭人已經建立了他們的第一批亞洲基地，從那裡他們可以輕而易舉地進攻來往於中國海和印度的葡萄牙船隊，耶穌會士的文獻中鮮有關於“博愛”號的記載。⁽¹⁴⁾

正如我在前面談到的，耶穌會士們和葡萄牙人一般來說試圖抵消新來的人對日本新君的影響，但是在他們與外界的通訊中，這件事情很快就被提到了。唐·路易士·賽爾凱拉 (D. Luís Cerqueira)⁽¹⁵⁾ 在他1600年10月22日的信中就提到了他們，而在那兩天以前，監會神父范禮安也在一封信中對此有所提及。提到這件事情的還有落款為1600年10月25日

日本副主教的年度報告。在這個文件中，船員被稱作是來自佛蘭德 (Flandres) 的“英國人”，並強調他們“帶來了許多大砲和槍支”。⁽¹⁶⁾ 在此後幾年的私人信件中，再也沒有關於這件事情的隻言片語，而在1601年2月21日⁽¹⁷⁾、1601年9月30日⁽¹⁸⁾ 和1603年1月1日⁽¹⁹⁾ 的年度報告中也沒有關於亞當斯及其同伴的內容。

德川家康和“博愛”號的倖存者尤其是與英國水手威廉·亞當斯 (William Adams) 之間在16世紀建立的聯繫比預料的要持久很多，因為荷蘭人後來變成了日本江戶 (Edo) 幕府統治時期的唯一對話者。一方面，這種壟斷地位的建立是荷蘭人在歐洲對東亞海域的競爭⁽²⁰⁾ 中取得的軍事勝利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對幕府長期工作的結果；荷蘭人接近幕府的目的不在於向日本人推介荷蘭的形象，而是為了打擊伊比利亞人。當日本新的中央政權對基督教的擴張感到擔心⁽²¹⁾ 的時候，正是一群基督徒

提醒他注意傳教士和支持傳教士的商人們的活動所帶來的危險。

由於17世紀20年代開始接連出現的陰謀行為，加之聯合東印度公司（VOC）和東印度公司（EIC）商船的出現，終於使德川家康作出禁教的最後決定。

動盪時期

有二十一人逃脫了“博愛”號的厄運⁽²²⁾，但是，其中三人在不久後死去；1600年的年度報告提到祇有四、五人站住了腳。從那時起，倖存者們在新的地方開始了他們的新生活，幾乎所有的人都留在了那裡直到生命結束。他們之間沒有形成一個團結的整體，後來，亞當斯曾指責在他的同伴中有兩人：希斯貝特·德·科寧（Gisbert de Coning）和揚·埃布森（Jan Abelszoon）有背叛行為，企圖將他們交給葡萄牙人。⁽²³⁾暫且不論其指責是否屬實，也許確有其事，但它卻表明伊比利亞人和新教徒之間一直存在的緊張關係。

最成功的兩個人要數威廉·亞當斯和耶揚子（Jan Joosten van Lodensteyn）；他們成了直接隸屬於幕府的旗本（*hatamoto*）和武士（*samurais*），並獲得了對外派遣“朱印船”的許可；他們本來有機會返回歐洲，卻寧願留在接納了他們的日本。他們致力於遠東貿易，參加了一些旅行，1623年，耶揚子死於一次海難。⁽²⁴⁾

這些人的存在對於那些為了把他們像盜賊一樣釘死在十字架上而願意做任何事情的傳教士來說是一個沉重的打擊⁽²⁵⁾；耶穌會士意識到新教徒的出現將要引發的新問題：他們可以吸引那些來往於因蘇林迪亞（*Insulindia*）海上並影響着澳門和果阿關係的商人；除此之外，他們將敗壞天主教和伊比利亞人的整體形象。

正如我在前面提到過的那樣，關於耶穌會士曾與“博愛”號的倖存者見面這一點，我們掌握的資料不多；可以肯定的是，一位在“博愛”號⁽²⁶⁾出現後不久到達豐後（*Bungo*）的耶穌會神甫充當了他們的翻譯，並且佩德羅·莫雷洪（*Pedro Morejón*），畿

內（*Kinai*）的教區神甫，曾於7月在大阪與亞當斯會面。⁽²⁷⁾

儘管威廉·亞當斯漸漸得到了德川家康的信任，他的言行損害了天主教徒的形象，但是由於沒有荷蘭或者英國商人，這位從前的水手的行動並沒有收到實際的效果，因為澳門和馬尼拉商人的處境未見發生甚麼變化。儘管如此，唐·路易士·賽爾凱拉神甫至少曾有一次試圖使那些討厭的人離開。那是在1606年，陸若漢（*João Rodrigues Tçuzu*）在一次訪問江戶的時候，與亞當斯見了面，並以神甫的名義送給他一張通行證，以便他和他的同伴有可能在長崎上船安全地離開日本。⁽²⁸⁾

平戶（*Hirado*）的商館

儘管聯合東印度公司逐漸掌握了海上的強勢，但是他們的船隻到達日本列島還是幾年之後的事情。1608年2月，聯合東印度公司駐北大年（*Patane*）總監維克多·斯普林科（*Victor Sprinckel*）在寫給亞當斯的一封信中解釋說，行動的遲緩是由於葡萄牙人在遠東海上仍然具有實力。⁽²⁹⁾第一艘前往日出帝國的船“米德爾堡”（*Middelburg*）號於1605年離開荷蘭，但在1606年8月拉查杜角（*Rachado*）的戰鬥中沉沒了。⁽³⁰⁾後來在1607年，由於將要與西班牙簽署一項協定，阿姆斯特丹發出命令要求在協定簽署之前爭取獲得新的地盤。⁽³¹⁾在這一年來到東方的船隻中，就有“羅澤·萊烏·皮倫”（*Rode Leeuw met Pijlen*）號和“格里芬”（*Griffioen*）號，它們在1609年5月4日受命前往中國海攔截商船或與日本人進行直接接觸。

由於“天黑”⁽³²⁾，荷蘭人沒能追上安德列·佩索阿（*André Pessoa*）的船，於1609年7月1日停靠在平戶。⁽³³⁾他們很快就得到了幕府的居住許可，並建立了以雅戈斯·斯皮克（*Jacques Specx*）為領導的商館，同年10月，他們返回因蘇林迪亞。

荷蘭人在平戶的出現當然使伊比利亞人感到不快，因為不論是澳門和馬尼拉的貿易還是他們的使命都將受到影響。在1609年10月10日寫給國王的

信中，唐·路易斯·賽爾凱拉對新形勢進行了頭腦清醒的分析，其中他提到“這場災害”已經降臨到日本，長此以往，它將成為葡日貿易和基督事業的終點。⁽³⁴⁾正如人們看到的那樣，第一個提到對局面“非常擔心”的神甫其預料完全正確。

在同一封信中，神甫報告說，當荷蘭人剛剛來到平戶，天主教徒就立刻開始做德川家康的工作，希望趕走新來的人，說他們是海盜，說他們想摧毀長崎的貿易。賽爾凱拉抱怨說，德川家康被“博愛”號倖存者所“誤導”；說聯合東印度公司的饋贈是從一艘來往於澳門和印度的商船上截獲的從莫三比克搶來的象牙和在新加坡搶來的剩餘物資。賽爾凱拉還表示希望當局不要對荷蘭人抱有幻想，因為他們不能像所承諾的那樣給日本帶來中國的商品。⁽³⁵⁾

我們認為這份報告特別重要，因為它向我們展示了開始於1600年關係的發展方向：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把寶押在了情報戰上，竭力通過各種手段詆毀敵人的形象。

當瞭解到荷蘭人取得的進展之後，菲利浦三世要求菲律賓總督組織一支艦隊阻止敵人獲得中國絲綢。⁽³⁶⁾顯而易見，新教徒的勝利開始轉向獲取這種商品，國王知道，在這種時候，祇有馬尼拉更有條件立即採取行動。

但是，在日本，除了對貿易和使團的生存憂心忡忡之外，耶穌會士們在一開始擔心的是聯合東印度公司的官員帶來新教傳教士。在1610年3月15日的一封信中，巴範濟（Francisco Pasio）這樣寫道：

久保〔德川家康〕⁽³⁷⁾准許荷蘭人在平戶的港口建立商館，要求他們承諾每年到這個港口來，從他們的國家帶來更多的商品以及葡萄牙人的商船能夠帶來的所有商品。除了葡萄牙人的商船面臨危險外，如果他們繼續這項貿易的話，我們擔心他們會在日本散播異端邪說。⁽³⁸⁾

在這個方面，耶穌會士們還不瞭解荷蘭人的做法，與葡萄牙和西班牙商人相反，荷蘭人並不想讓傳教事業干擾他們的貿易。

1610年3月15日的年度報告重新提到了這件事情；但是，作者沒有特別強調這件事情，祇是說巴達維亞的船已經抵達平戶三個月，荷蘭人拜訪了德川家康並得到了留駐代理商的許可。⁽³⁹⁾

1610年，聯合東印度公司沒能向平戶派遣船隻，這是因為本來應當到這裡來的船隻捲入了對馬尼拉失敗的進攻。⁽⁴⁰⁾這個失誤使得伊比利亞人獲得了希望，並使得他們加強了趕走北方敵人的努力。但是，安德列·佩索阿事件使得澳門的商船再也沒有來，同時，已經前往馬尼拉的日本船隻卻遲遲不歸。

荷蘭在平戶商館的總監雅戈斯·斯皮克同樣經歷了十分焦慮的日子。1610年11月，他發現，長崎的商人開始相信沒有商船到來是由於荷蘭人是海盜，這正如威廉·科爾（William Corr）提到的那樣，至少在中國海這是事實。⁽⁴¹⁾斯皮克乘坐一艘“朱印船”來到北大年，談成了幾筆布匹的買賣並將這些貨帶到了平戶。1611年7月他回到了平戶。⁽⁴²⁾

1611年，來自帕塔的荷蘭“布拉克”號（*Braeck*）船來到平戶，雖然它沒有帶來真正使人感興趣的貨物，卻使聯合東印度公司贏得了時間，尤其是他們得到了德川家康一個親信威廉·亞當斯的幫助。當時，他已經接替陸若漢擔任了德川幕府外貿顧問。⁽⁴³⁾亞當斯當時擔任的這個職務使他對日本對外貿易和所有試圖控制遠東海上貿易航線的歐洲競爭者的未來都起着決定性的作用。

第二年，曾經拜訪過幕府朝廷的葡萄牙使團在駿河（Suruga）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情況：

〔特使〕從長崎帶來了一個多年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做翻譯的日本人，但 Conzuquedono 不允許該翻譯講話，也不許他帶來的同樣擔任翻譯的聖方濟各派的一個修士這樣做，卻命令一個叫吉列爾梅（Guilherme）的水手擔任翻譯，並將一些貿易事務委託給他辦理。⁽⁴⁴⁾

這一年，荷蘭人對日本列島的緩慢滲透已經十分明顯。同年5月10日，若奧·羅德里格斯·吉朗





日本地圖 梅特路斯 (N. Metellus) · 1596 年繪

(João Rodrigues Girão)神甫在耶穌會傳教士中很少見的一封私人信件中也提到了荷蘭人：

荷蘭人將在日本站穩腳跟，他們得到了久保的批准，並在平戶設立了一家商館；去年，他們隨一艘船來到這裡，帶來極少或者說沒有帶來任何商品，他們說今年還要繼續來日本，給暹羅好像還有馬魯古的人帶去糧食和肉類供應。⁽⁴⁵⁾

1612年，荷蘭人的船果然回來了。11月15日，唐·路易士·賽爾凱拉抱怨說，巴達維人繼續指責南蠻人，例如指責他們不是在真正的佈道。⁽⁴⁶⁾第二年，伊比利亞人的問題更多起來。10月5日，唐·路易士·賽爾凱拉向國王報告說，這一年荷蘭的船沒有來，卻來了一艘英國船，“帶來了他們國家的布匹和其它東西”以及香料，他們的商人好像是在獨立行動，而不是與荷蘭人共事。⁽⁴⁷⁾

但是，神甫最大的擔心仍然主要是與馬尼拉修士們的爭執。他在這一年10月6日寫給耶穌會總監的信中談到了在江戶發生的新的迫害行為。賽爾凱拉祇是指責方濟各會的修士應對此負責，而沒有提到新教徒越來越大的勢力正在為德川家康對基督教採取更不可容忍的政策打開了方便之門。⁽⁴⁸⁾

英國人早就試圖從東北方到達日本，他們為此一直在尋找一道不受葡萄牙人控制的航線。在耶穌會士帶到歐洲的情報的激勵下，莫斯科維亞公司 (Companhia da Moscúvia) 在1580年就已經派遣兩艘分別為四十噸和二十噸位的船，在亞瑟·佩特 (Arthur Pet) 和查里斯·傑克曼 (Charles Jackman) 的率領下，企圖從北面繞過亞洲。⁽⁴⁹⁾之後，在1602和1606年，莫斯科維亞公司和東印度公司聯合組織了兩次遠征，目的在於找到從西北方面到達日本的通道。當英國人發現不可能找到另外的線路之後，他們決定從南面到達日本⁽⁵⁰⁾；在17世紀初，

他們希望日本列島對於他們的棉布是一個好市場，因為在林旭登（Linschoten）的描述中，日本是一個寒冷的國家。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從北方找到一條線路的假設並沒有被立即放棄，因為在後來的幾年中，約翰·薩利斯（John Saris）重新建議尋找西北航線，並建議以平戶所建立的新基地為此航線的出發點。⁽⁵¹⁾

1611年，東印度公司組織了第七次航行，這是第一次按照指令到達日出列島的航行。但是，我們根據商館總監們在暹羅收集到的關於這次航行的情報推測，日本的貿易並未受到重視。⁽⁵²⁾然而就在同一年，該公司又派出了另一支艦隊，作為附帶任務帶去了在日本列島建立商館的具體命令；這支艦隊由三艘船組成，於1611年4月18日啟航，艦隊司令約翰·薩利斯乘坐“丁香”號（Clove）。⁽⁵³⁾

“丁香”號於1613年6月9日抵達日本，兩天之後在平戶拋錨。8月7日，約翰·薩利斯在威廉·亞當斯的陪同下前往幕府朝廷，9月8日在駿府（Sunpu）受到了德川家康的接見；四天之後，他們啟程前往江戶，並於14日到達江戶，17日受到德川秀忠（Tokugawa Hidetada）的接見；10月8日，統治者們授予東印度公司特權，11月6日，薩利斯和亞當斯已經回到了平戶。德川家康建議英國人把商館設在浦賀（Uraga），但是英國像荷蘭人一樣寧願選擇平戶。薩利斯認為，萬丹（Bantem）不是日本貿易的理想夥伴，因此決定商館在未來主要與暹羅市場打交道。⁽⁵⁴⁾

英國人從來沒有能夠把他們的利益強加給日本，他們在平戶的商館祇維持了十年；但是，他們的出現對幕府最終作出斷絕與教會和基督教聯繫的決定肯定是至關重要的，因為，他們的態度證實了新教徒並不像天主教徒那樣關心傳教事業。東印度公司的官員試圖擴大他們在日本的貿易，在津島（Tsushima）建立分支機構，以便滲入畿內和江戶的日朝貿易當中⁽⁵⁵⁾，在那裡採取的是與葡萄牙人和荷蘭人不同的政策。但是，德川秀忠不允許東印度公司這樣做，並於1616年迫使他們將其活動僅僅局限在平戶。



德川家康畫像

歐洲人在日出之國的對抗

如我前面所說，自從“博愛”號的船員出現在日本，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就系統地展開了在日本當局面前互相詆譏的活動。威廉·亞當斯在寫於1611年10月23日的一封信中明確提到這種互相敵視的關係。他在談到自己到達日本時，談到視葡萄牙人、耶穌會士甚至日本的基督徒是自己的“死敵”：“我們到達兩、三天之後，從一個叫蘭加薩卡



豐臣秀吉畫像

(Langasack) 的地方來了一位耶穌會士。阿媽港 (Amakan) 的大帆船每年都會光顧這裡一次。與日本人一起來的還有基督徒，這些基督徒充當了我們的翻譯，但是他們不會幫我們說話，反而是我們的死敵。”⁽⁵⁶⁾

最初，雖然由於幕府的保護，“紅毛人”可以進入長崎，但這裡對於他們來說仍然是一個充滿敵意的地方。1613 年年底，理查·考克斯 (Richard Cocks) 同威廉·亞當斯、艾德蒙·賽耶斯 (Edmund

Sayers) 一起來到長崎想購買一艘帆船；當他們在城市裡行走時，英國人被居民嘲諷地稱為“路德教徒”和“異教徒”。⁽⁵⁷⁾ 在我們看來，這件事反映了在日本出現的對抗形勢的另一個側面。教士們沒有能力左右政權當局，便利用傳教事業與敵人進行對抗；這種努力肯定不會有甚麼大的實際結果，卻足以說明歐洲人在東亞的爭鬥是多麼激烈。

當時，考克斯和他的同伴們沒有找到船，這表明在這個幾乎祇效忠於天主教會的城市裡他們是不受歡迎的人。儘管如此，他們還是使商館的兩個成員坦皮斯特·皮科克 (Tempest Peacock) 和瓦爾特·卡瓦登 (Walter Carwarden) 登上了一艘船主是中國人的“朱印船”；兩位商人於 1614 年 3 月 18 日離開長崎前往交趾支那 (Cochinchina)，但不久他們被船員殺害。關於這件事流行的一種說法是，皮科克是在一些荷蘭商人的陪伴下在交趾支那的一條河上旅行時死去的，他成了當地人向荷蘭人復仇的意外犧牲品⁽⁵⁸⁾；另一種說法是，卡瓦登喝醉了酒得罪了日本人⁽⁵⁹⁾。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事件中，受害者的同伴都沒有在場；起初，它們是由日本人自己講出來的，因此不能保證所有的說法與事情的真相相吻合。

死亡事件可能純屬偶然，或者是日本船員貪慾的結果，但是，考慮到他們大部分應當是基督徒並且與澳門的葡萄牙人和長崎的教會有密切的關係，所以，我們認為有可能是歐洲的天主教徒至少出於對英國旅行者的極其不信任，從而認為有必要設計將他們除掉。

如我前面所說，這艘船的船主是中國人，但應當說，長崎的中國僑民大部分也是天主教徒。⁽⁶⁰⁾ 除了歐洲人之間的敵視之外，聯合東印度公司和東印度公司在平戶建立商館加劇了日本兩個港口之間的競爭，這也有利於說明這一事件的發生，因為住在長崎的亞洲商人對歐日貿易在一個敵對的港口的發展感到不安。

在互相敵視的關係中，我們還發現，對上司感到不滿的人有機會離開他們的職位向敵對的一方尋求幫助。例如，“丁香”號剛剛抵達不久，七個水手



1650 年的長崎市和港口（里斯本海軍博物館存）

引自《東西方交匯圖》（1994 年紀念葡萄牙地理大發現澳門委員會出版）

就開了小差，躲到長崎，以逃避英國艦長。⁽⁶¹⁾

不久之後，從帝國中心傳來了對於教廷來說是致命的同時亦令新教徒感到高興的消息：1614 年 1 月 27 日，幕府頒佈了禁教令，命令所有天主教人員離開日本。1614 年 2 月 17 日，考克斯在寫給身在江戶的理查·維克漢（Richard Wickhan）的信中提到了關於禁教令的傳言是“再好不過的真事”。⁽⁶²⁾

在後來的幾年中，新教徒繼續他們的詆毀政策，並且從幕府與伊比利亞商人之間的緊張關係中獲益。⁽⁶³⁾應當注意的是，他們在亞洲的其它地區也採取了同樣的政策，1617 年 12 月 8 日，佩德羅·馬爾科斯（Pedro Marques）神甫就曾指責英國和荷蘭商人在柬埔寨國王面前說他的壞話。⁽⁶⁴⁾

英國人和荷蘭人還竭力阻止秘密傳教士的行動，例如從海上攔截他們。儘管不是次次都取得了成功⁽⁶⁵⁾，但 1620 年和 1621 年之間發生的“伊莉莎白”號（*Elisabeth*）攔截一艘日本帆船的事件是所有

衝突中最為慘烈的一次。當時，這艘日本船上有兩名前往日本的托鉢僧，即多明我會的路易士·弗洛雷斯（Luís Flores）和奧古斯丁會的佩德羅·祖尼加（Pedro Zuñiga）。他們被帶到平戶交給了當局，最初被關押在荷蘭人的商館，後來被送到江戶，最後被證實是教士，在 1622 年在長崎發生的殉道事件中被活活燒死。⁽⁶⁶⁾

有必要注意的是，長崎的行政長官（Hasegawa Gonroku）認識祖尼加，卻沒有認出他來。如果對祖尼加的指責不能得到證實，這有可能導致新教商人被趕走。Gonroku 希望葡日貿易繼續下去，並感到貿易受到在平戶出現的競爭的損害，因此，他有可能竭力在幕府詆毀新教徒。然而，就像在其它時候所發生的一樣，與伊比利亞利益相關的集團在這場衝突中敗下陣來，處於不利的局面。

1621 年 11 月 25 日，約翰·奧斯特維克（John Osterwick）在談到最終決定時鬆了一口氣：“感謝

上帝，經過一晝夜的艱難行程，現在我們達到了目的，把他們趕得更遠。”⁽⁶⁷⁾不久之後，考克斯說，他們和聯合東印度公司的官員們現在希望受到朝廷的歡迎。⁽⁶⁸⁾

儘管新教徒承認幾千天主教徒頂住迫害的英雄行為，但就像羅馬教派的群體在英國被殘酷地對待那樣，這個群體消失並不使新教徒們感到憂慮。理查·考克斯寫於1620年3月10日的一封信似乎向我們預見到了這種前景：

從這些團隊傳來的消息看，你要知道這個皇帝對天主教徒來說是大敵，特別是日本天主教徒。所以，這些人都被處死。我在 Miaco 的時候，一次就看到五十五個人被處死，因為他們不肯放棄天主教信仰，他們中間有五、六歲的孩童，被燒死在母親的懷中，嘴裡還喊着“耶穌拯救他們的靈魂吧！”（……）據說，在監獄和其它地方還有很多，他們時刻都有可能被處死，因為很少人改變信仰。⁽⁶⁹⁾

考克斯因為幕府仇視天主教徒而感到高興，他的表達方式對於瞭解在日本的荷蘭人和英國人的態度毫無疑問是一個極好的例子。除此之外，這份檔的特別重要性還由於它是新教徒寫的關於殉教者的文字。事實上，聯合東印度公司總監的這段文字與當時傳教士們寫的文章具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因此，這封信向我們證實了天主教徒的檔所傳遞的可悲形象並且向我們明確無誤地表現了基督教在一開始是怎樣面對迫害的。教會的這些文獻中經常談到的日本教徒的英雄壯舉似乎相當真實。祇是後來，當幕府的官員開始要求個人効忠宣言的時候，這些天主教徒才動搖並且在表面上退卻了。這種情況後來由於寇里斯托望·費雷拉（Cristóvão Ferreira）的背叛變得越來越快。

通過這些檔——儘管我們剛剛引用的信中表現着冷酷——可以發現，大部分聯合東印度公司和東印度公司在日本的成員都是同澳門或者菲律賓的商人一樣虔誠的天主教徒。至於英國人，我們知道一

起作禱告是他們每天必修的功課，至少在船上是一樣，除此之外，官方也有完全按照基督倫理精神規定的嚴格的行為規範。例如，當時就規定船員除了被禁止褻瀆上帝、起誓、酗酒和偷盜之外，還必須行為友善，必須在每天早上和晚上參加兩次集體禱告。⁽⁷⁰⁾在倫敦，船員還得到一些宗教書籍，例如關於殉教者的材料；我們還瞭解到，在理查·考克斯的個人書籍中就有聖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⁷¹⁾，表明這位商館總監對神學肯定有一些瞭解。

但是，自從17世紀20年代起，東印度公司開始關心派遣隨軍神甫的問題，這些隨軍神甫的任務在剛剛開始的階段僅僅是陪伴船員和砲臺的守軍。事實上，當時，不論是在英國還是在荷蘭雖然都曾出現過不同的意見，但在印度的新教教會幾乎完全對傳教事業漠不關心。⁽⁷²⁾

後來在1637年，荷蘭人在獲得歐日關係的壟斷之前，重新參與了對基督徒的迫害。在島原（Shimabara），荷蘭的一艘船“戴立普”號（*De Ryp*）砲轟了被包圍在 Hara 砲臺的起義者。根據瓦爾德馬爾·戈蒂尼奧（Valdemar Coutinho）的記錄，荷蘭船隻的介入從軍事角度看並不重要⁽⁷³⁾，卻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因為它表明新教徒除了對在日本的傳教事業不感興趣，不掩護那些秘密的傳教士之外，還與幕府聯合在一起，甚至參與了對明顯帶有宗教色彩的社會起義進行的鎮壓。

我們認為，這個插曲在我們對所有過程的分析中具有象徵意義：荷蘭人在日出帝國的成功是以破壞當地與羅馬教廷相聯繫的基督事業為基礎的。雖然荷蘭人在海上佔據着優勢，但是要在與日本的貿易中戰勝葡萄牙人，他們感到了巨大的困難，這一點正像17世紀30年代聯合東印度公司的文獻中記載的那樣。⁽⁷⁴⁾

這樣，新教徒在日本列島的教會被迅速摧毀的過程中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雖然帝國的政治統一是由於採取了 *shinkoku*（帝國）的觀念才得以完成，天主教並沒有參與其中，但是，不論是豐臣秀吉（Toyotomi Hideyoshi）還是德川家康從來也不想放棄與歐洲人的貿易。很有可能的是，即使“紅毛人”

不出現，幕府仍然會繼續一種強烈的反天主教的政策，但很難出現像 1614-1639 年期間發生的如此極端的做法。

值得注意的是，豐臣秀吉雖然驅除了天主教傳教士，卻從來也沒有實施命令，而當德川家康當上日本帝國絕對君主的時候，就接見了威廉·亞當斯；這就是說，德川家康在制定他的對內政策時，希望天主教“南蠻人”的敵人“紅毛人”之到來，儘管如此，他祇是當兩個“紅毛商人”集團在平戶建立之後才完成了對天主教徒決定性的一擊。四分之一世紀過去之後，幕府最終放棄了與澳門商人的貿易夥伴關係。

結 論

我們認為，熱羅尼莫·羅德里格斯（Jerónimo Rodrigues）在 1614 年 3 月 18 日寫給耶穌會會長的信中對新教徒在這一政策的執行過程中作用的分析是正確的：驅除教士們是由於對天主教事業的仇恨、害怕他們會在未來取得成功以及異教徒的挑撥離間而引發的“重大事件”。⁽⁷⁵⁾

在驅除教士事件之前，日本的天主教事業儘管歷史很短，卻體會到來自同一教廷的宗教派系之間的敵視，除此，還經歷了西歐基督教生活中最突出的矛盾：新的分裂在教徒之間種下了彼此的仇恨。毫無疑問，天主教在歐洲發生的悲劇，以北方的“紅毛人”以合作者身份毫無顧忌地幫助了對天主教徒的屠殺方式影響了日本列島；即便雙方互換一下位置的話，結局也不會有甚麼大的不同。

【註】

- (1) 許多重要的著作都論述過關於日本的天主教歷史，其中我們要強調的是下列幾部著作：博克塞（C. R. Boxer），《日本的基督世紀》（*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曼徹斯特，Carcaret 出版社，1993（第一版，1951）；萊昂·布林東（Léon Bourdon），《1547-1570 年耶穌會在日本》（*La Compagnie de Jésus et le Japon 1547-1570*），巴黎：古本江基金會；里斯本：葡萄牙紀念地理大發現全國委員會，1993；喬治·埃利森（George Elisen），《被毀滅的上帝，天主教在早期近代日本》（*Deus destroyed, the image of*

Christianity in Early Modern Japan），劍橋，Mass./倫敦：哈佛大學出版社，1988（第一版，1973）；約瑟夫·佛朗茨·舒特（Josef Franz Schutte S. J.），《范禮安的日本使命》（*Valignano's mission principles for Japan*），2 卷，聖路易：1980-1985；尼爾·藤田（Neil Fujita），《日本與天主教的相遇》（*Japan's encounter with Christianity*）。《天主教團在早期近代日本》（*The Catholic mission in pre-modern Japan*），紐約：Paulist 出版社，1991。可見我的研究著作：《十六世紀日本和天主教》（*Japão e Cristianismo no Século XVI*）、《葡日歷史文集》（*Ensaio da História Luso-Nipônica*），里斯本：葡萄牙獨立歷史協會，1999。

- (2) 關於西班牙人在日本列島的情況，可參看胡安·吉爾（Juan Gil）：《貴族與武士》（*Hidalgos y samurais*）、《十六和十七世紀的西班牙與日本》（*España y Japón en los siglos XVI y XVII*），馬德里：出版聯盟（Alianza Editorial），1991。
- (3) 關於葡西敵對的情況，可參看羅伯特·卡內羅（Roberto Carneiro）和阿爾杜爾·特奧德羅·德·馬托斯（Artur Teodoro de Matos）編纂的紀念葡日友誼四百五十年（1543-1993）國際研討會文集《日本的天主教世紀》（*O Século Cristão do Japão*）中我的文章〈葡西在遠東的敵對和在日本的教士紛爭〉，里斯本：1994，第 477-524 頁。之前提到的本人博士論文第 5 和第 15 章特別論述了此問題。關於這件事情，奧地利王室當時控制着整個伊比利亞王國，因此，在東亞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沒有系統的協作。事實上，兩個海外帝國彼此保持着分立狀態，正因為這樣，他們之間傳統的敵對仍在繼續，不僅如此，由於大部分葡萄牙人難以接受一個外國國王的統治，他們之間的敵對更加尖銳。因此，馬尼拉的修士來到日本列島帶來了一系列紛爭，這些紛爭許多時候使得天主教僧侶們看不到新教商人們帶來的威脅。在耶穌會的文獻中，比起荷蘭和英國商團的代理人來說，西班牙教會的修士們對基督徒的迫害事件常常要負更大的責任。
- (4) 關於“博愛”號和其他艦隊船隻的情況，可參見威廉·科爾《水手亞當斯》（*Adams, the pilot.*）、《威廉·亞當斯船長生活的時期，1564-1620》（*The life and times of Captain William Adams, 1564-1620*），桑蓋特：1995，頁 23-37。
- (5) 1600 年 10 月 25 日日本教區的年度報告，BA，49-IV-59，頁 35。
- (6) 關於江戶幕府的創立者德川家康以及他與基督徒的關係，可參見耶穌會士蜜雪兒·科帕（Michael Cooper）的《翻譯羅德里格斯（陸若漢），一個耶穌會士在日本和中國》（*Rodrigues, o intérprete, um jesuíta no Japão e na China*），里斯本：科薩爾（Quatzal）出版社，1994（第一版，1974）；薩德爾（A. L. Sadler），《現代日本的締造者德川家康幕府的生活》（*The maker of modern Japan, The life of shogun Tokugawa Ieyasu*），東京：1992（第一版，1937）；康拉德·陶德曼（Conrad Totman），《德川家康：幕府》（*Tokugawa Ieyasu: shogun*），海恩：1983。



- (7) 這次航行的船長是居住在澳門的葡萄牙人唐·保祿 (D. Paulo)，他代替奧拉西奧·內雷特 (Horácio Nerete) 在這艘開往日本的船上擔任船長。參見博克塞，《來自阿媽港的大船，1555-1640 年間澳門與古老日本貿易編年史》(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里斯本：海外歷史研究中心，1963，頁 62。
- (8) 1590 年，豐臣秀吉統一了日本帝國。1587 年，他向全國下達了第一個反天主教敕令。關於他的生平，主要可參見瑪麗·伊莎貝爾·貝里 (Mary Elisabeth Berry)，《豐臣秀吉》，劍橋，Mass./ 倫敦：哈佛大學出版社，1982。
- (9) 《1615 年 1 月記錄的關於荷蘭人進入日本和後來發生的一些情況的報告》。皇家歷史研究院 (RAH)，馬德里，剪報，9/2666。
- (10) 見范禮安致葡萄牙助理的信。1600 年 10 月 20 日，長崎。Archivum Romanum Societatis Iesu (ARSI), Jap-Sin, 14 I, 頁 27。
- (11) 見第奧格·德·科托 (Diogo do Couto)，《亞洲十年》(Décadas da Ásia)，XII-v-2；博克塞，《簡·孔帕尼在日本，17-19 世紀荷蘭人對日本的文化藝術和科學的影響》(Jan Compagnie in Japan, an essay on the cultural, artistic and scientific influence exercised by the Hollanders in Japan from the seventee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ies)，海牙：1950，頁 26。
- (12) 見威廉·科：《水手亞當斯》，頁 89。
- (13) 見博克塞，《簡·孔帕尼在日本……》，頁 27-28。我在前面提到的現存於馬德里皇家歷史研究院的名單提到，1612 年荷蘭人開始向日本人教授製造火砲的技術。在此之前，葡萄牙人曾向大義善鎮 (Otomo Yoshishige) 提供過一些大砲，但是，他並未從中獲得好處；1584 年，薩摩 (Satsuma) 和有馬 (Arima) 在與進攻島原半島的 Ryuzoji Takanobu 的軍隊作戰中，兩種輕型的火砲對他們取得勝利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見我的研究：〈從路易士·弗洛伊斯的日本史看日本的火器引進〉(A introdução das armas de fogo no Japão à luz da História do Japão de Luís Fróis)，見《十六世紀的日本與天主教》(O Japão e o Cristianismo no Século XVI)，頁 71-86。
- (14) 在這項研究中，我把被荷蘭人和英國人同樣視為敵人的托鉢僧和西班牙人的反應放在一邊，因為他們在日本列島的出現與東方葡萄牙教會的耶穌會士的出現相類似，並且帶有競爭的性質。在與新教商人競爭的同時，作為耶穌會天主教徒的西班牙商人和僧侶們還企圖擺脫印度總督或者果阿的大主教建立自己的勢力範圍。除此之外，西班牙人有著與新教徒類似的弱點，因為他們也是新來的人，還沒有建立起像葡萄牙人那樣鞏固的陣地。
- (15) 對這位神甫的研究，除了之前所提到的本人研究外，還有伊納西亞·魯米克·卡塔奧卡 (Inácia Rumiko Kataoka) 的重要研究：《耶穌會日本天主教唐·路易士·賽爾凱拉的主教生涯 (1598-1614)》(A Vida e a Ação Pastoral de D. Luís Cerqueira S. J., Bispo do Japão (1598-1614))，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7。
- (16) 見阿茹達圖書館 (BA)，49-IV-59，頁 35。
- (17) 見 BA，49-IV-59，頁 53v-76。
- (18) 見 BL，Add. 9859，頁 149-191。
- (19) 見 ARSI, Jap-Sin, 54，頁 218-262；BA, 49-IV-59，頁 76-112v。
- (20) 關於葡萄牙人和荷蘭人 17 世紀初在東方的對抗，可參見桑賈伊·蘇拉馬尼亞姆 (Sanjay Subrahmanyam) 所著《葡萄牙帝國在亞洲 1500-1700》(The Portuguese empire in Asia, 1500-1700)，倫敦/紐約：朗文，1993，頁 107-180；德雷克·馬薩勒拉 (Derek Massarella) 所著《另一個世界：16 和 17 世紀歐洲邂逅日本》(A world elsewhere. Europe's encounter with Japan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紐黑文/倫敦：耶魯大學出版社，1990，頁 314-323；約納坦·伊斯拉埃爾 (Jonathan I. Israel)，《世界貿易中的荷蘭優勢 (1585-1740)》(Dutch primacy in world trade, 1585-1740)，牛津：牛津大學出版社，1989，頁 38-196。
- (21) 關於 16 世紀末日本基督教的政治作用，可參看本人研究文章〈1600 年危機中的德川家康和基督徒大名〉(Tokugawa Ieyasu and the Christian daimyo during the crisis of 1600)，見《葡日研究》，里斯本，第 7 期，2003，頁 45-71。
- (22) (23) (24) 見威廉·科：《水手亞當斯……》，頁 87；頁 93；頁 97-98。
- (25) 見博克塞：《日本的基督世紀》，頁 285。
- (26) 第一個耶穌會士是在他到來之後的二、三天之後與“博愛”號的倖存者一起出現的。見威廉·亞當斯寫給在萬丹 (Bantem) 的一個朋友的信。平戶，1611 年 10 月 23 日。《在日本的英國商站，1613-1623》(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3-1623)。出版社：Anthony Farrington，倫敦：大不列顛圖書館，1991，I，頁 68。
- (27) 見耶穌會士約瑟夫·佛朗茲·舒特 (Josef Franz Schütte)，〈大阪耶穌會總監對威廉·亞當斯家的訪問 (大阪，1607 年 7 月)〉，科英布拉大學學報，1980 年，頁 209-230。
- (28) 見耶穌會士蜜雪兒·科帕，《翻譯羅德里格斯……》，頁 211。
- (29) 見博克塞，《日本的基督世紀……》，頁 288；威廉·科，《水手亞當斯……》，頁 111。
- (30) 見威廉·科，《水手亞當斯……》，頁 109。關於這場海戰的情況，可參見薩圖爾尼諾·蒙特伊洛 (Saturnino Monteiro)，《葡萄牙海軍的戰役》(Batalhas e Combates da Marinha Portuguesa)，第五卷，里斯本：薩·達·科斯塔 (Sá da Costa) 書店，1994，頁 29-40。
- (31) 見德雷克·馬薩勒拉：《另一個世界……》，頁 83。
- (32) 根據皇家歷史研究院資訊。
- (33) 見博克塞：《日本的基督世紀……》，頁 289。威廉·科，《水手亞當斯……》，頁 111。

- (34) (35) 見皇家歷史研究院，剪報9/2666，頁309；頁309v。
- (36) 見國王致菲律賓總督的信。1611年12月19日。印度總檔案館（AGI），《菲律賓》，329，卷2，頁140v-141。
- (37) 德川家康1605年擔任此職，在這之前他把幕府讓位給他的繼承者德川秀忠。
- (38) 巴範濟（Francisco Pasio）致大主教的信，BL，Add，9860，頁204。
- (39) 見 ARSI，Jap-Sin，56，頁165。
- (40) 見博克塞：《日本的基督世紀……》，頁289。
- (41) 見威廉·科：《水手亞當斯……》，頁112。
- (42) 見德雷克·馬薩勒拉：《另一個世界……》，頁86。
- (43) 見博克塞：《日本的基督世紀……》，頁290；威廉·科，*《水手亞當斯……》*，頁112。
- (44) 見皇家歷史研究院，剪報9/2666。
- (45) ARSI，Jap-Sin，15 I，頁144。
- (46) 見唐·路易士·賽爾凱拉致國王的信。長崎，1612年11月15日。皇家歷史研究院，剪報，9/2666，頁174-175v。
- (47) 皇家歷史研究院，剪報，9/2666，頁260。
- (48) 見 ARSI，Jap-Sin，21 II，頁295-296。
- (49) (50) (51) (52) (53) (54) 這次遠征的主要目的是發現一條前往契丹（Cataio）的通道。“這些指令包括了宇宙學家約翰·迪（John Dee）先生關於怎樣使他們自己行為規矩。”迪（Dee）補充說，“你也可能有機會駛往日本島，在那裡你會發現來自許多天主教國家的教徒和耶穌會士，有些是英國人，他們會給你很多建議。”德雷克·馬薩勒拉，*《另一個世界……》*，頁64；頁127；頁95；頁64；頁70、90-96；頁106-124。
- (55) 同上，頁137-139。津島的商店很快就被關閉了，江戶的商館源於理查·考克斯的一個決定，因為約翰·薩利斯已經決定在在德川家康身邊駿府開設一個商館。
- (56) *《日本的英國商站》*，I，頁68。
- (57) 見博克塞：《日本的基督世紀……》，頁306。
- (58) 見 *《日本的英國商站》*，II，頁566。
- (59) 見德雷克·馬薩勒拉，*《另一個世界……》*，頁156。
- (60) 葡萄牙的文獻明確顯示，17世紀初，在長崎的中國僑民被看作是天主教徒並且與澳門-長崎軸心相關。例如我們知道，在迫害的最初幾年，秘密居住在日本的神甫就是通過中國商人保持着與澳門的聯繫。用這種方法，原來與天主教聯繫在一起的華僑在驅除天主教事件僅僅十年之後就在這個城市建立了佛教寺廟。
- (61) 1613年11月30日，理查·考克斯在寫給倫敦耶穌會主教的信中提到，這些海員“在天主教堂避難，並且被耶穌會士秘密地送到菲律賓”。*《日本的英國商站……》*，I，頁99。
- (62) “有報告說，所有在蘭加薩卡的天主教耶穌會士和神甫，與其它地方一樣，都要被驅逐出日本，但此消息太好了令我懷疑其真確性”。*《日本的英國商站……》*，I，頁134。
- (63) 例如，在1617年月的一封信中，理查·考克斯談到當一個葡萄牙商人被幕府的秘書問到日本教徒能否在果阿佈道時所感到的窘迫，此商人祇得承認那是被禁止的。見 *《日本的英國商站……》*，I，頁563。
- (64) 見佩德羅·馬爾科斯科斯（Pedro Marques）寫給葡萄牙副主教的信。ARSI，Jap-Sin，35，頁241-241v。關於在印度支那的葡萄牙人和敵對的新教徒之間的衝突，我們在 *《澳門神學院1594-1637年度報告》* 中找到一些有趣的記載（編輯：若奧·保羅·奧里維拉·科斯塔、安娜·費爾南德斯·平托）出版：紀念葡萄牙地理大發現澳門委員會和澳門基金會，1999年。
- (65) 在談到他再次來到日本的經歷時，加斯帕爾·德·卡斯特羅（Gaspar de Castro）神甫說，他藏在貨艙裡旅行了二十六天，他們的船曾遭到荷蘭人的襲擊。見1621年9月30日致葡萄牙副主教的信。ARSI，Jap-Sin，34，頁192。
- (66) 見德雷克·馬薩勒拉：《另一個世界……》，頁275；頁290-296。
- (67) 約翰·奧斯特維克致在巴達維亞（Batavia）的里查德·福斯蘭（Richard Fursland）的信。平戶，1621年11月25日。*《日本的英國工廠……》*，II，頁864。
- (68) 理查·考克斯致在巴達維亞的里查德·福斯蘭的信。平戶，1621年12月16日 *《日本的英國商站……》*，II，頁868。
- (69) 理查·考克斯致在倫敦的湯瑪斯·威爾森（Thomas Wilson）先生的信。長崎，1620年3月10日。*《日本的英國商站……》*，I，頁779。
- (70) (71) 見德雷克·馬薩勒拉，同上，頁96。注意，當約翰·薩利斯於1614年9月回到英國的時候，在他的個人行李中發現了一些他從日本帶回來的黃色書籍，這些書被沒收並於1615年1月當眾焚毀。同上，頁126；頁96。
- (72) 見德雷克·馬薩勒拉：《另一個世界……》，頁334。關於這一點，斯蒂芬·尼爾（Stephen Neill）在談到英國事件的時候說：“總體來說，東印度公司對傳教士的努力懷有敵意，倒不是對他們的理念有甚麼不滿，因為他們的理念建立在不干涉國家的關稅基礎之上，而是擔心宗教宣傳會激起居民的怨恨情緒，對商業發展有害”。斯蒂芬·尼爾：*《基督教傳教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頁198。
- (73) 見瓦爾德馬·科蒂紐（Valdemar Coutinho）：*《葡萄牙人在日本的消失》*（*O Fim da Presença Portuguesa no Japão*），里斯本：葡萄牙獨立史研究會，1999，頁55。
- (74) 見娜塔麗亞·托熱（Natália Tojo），〈商人無聲的焦慮：荷蘭人感受到葡萄牙人被日本驅逐的分量〉，*《葡日研究》*，里斯本，卷1，2000，頁111-128。
- (75) 見 ARSI，Jap-Sin，16 I，頁33v。

[本文是以本人1998年提交給里斯本新大學社會與人文學院的博士論文《日本的基督化和唐·路易士·賽爾凱拉的主教任職》尤其是以第19章為基礎寫成的。全文迄今尚未發表。]

蔚玲譯

